

王明蓀主編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五編 第二八冊

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 對華主張之分析(1947-1950)

吳昆財 著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五 編

王 明 蓀 主編

第 28 冊

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對華主張之分析
(1947~1950)

吳 昆 財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對華主張之分析（1947～1950）／吳昆財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1〔民 100〕

目 2+228 面；19×26 公分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五編：第 28 冊）

ISBN：978-986-254-441-9（精裝）

1. 中美關係 2. 美國外交政策

618

100000598

ISBN-978-986-254-441-9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五 編 第二八冊

ISBN：978-986-254-441-9

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對華主張之分析（1947～1950）

作 者 吳昆財

主 編 王明蓀

總 編 輯 杜潔祥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電子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初 版 2011 年 3 月

定 價 五編 32 冊（精裝）新台幣 5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對華主張之分析

(1947~1950)

吳昆財 著

作者簡介

吳昆財

學歷：淡江大學歷史系、台灣師範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中正大學歷史所博士。

經歷：雲林科技大學、嘉義師範學院兼任講師，南台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專任助理教授。

現職：嘉義大學史地系專任副教授。

主要研究領域：中美關係、國共關係、美國外交史、中國現代史。

提 要

1947至1950年是美國與中國外交關係最為關鍵的年代，如何面對瞬息萬變的中國政局發展，一直是美國思索的外交主要議題之一。基於共同的反共理念，美國當然希望國民政府能穩定中國政情，以便對抗蘇聯在東亞的擴張。但事與願違，國共在戰後的對抗過程中，國民黨由最初的勝券在握，其後是敵長我消，平分秋色，結局則是風雲變色，中共席捲中國，接著中國赤化，國府不得不撤退來台，以台灣作為維繫政權的最後據點。

面對這種詭譎多端，甚至始料未及的中國政局，的確深深困擾著杜魯門政府的對華外交政策。姑且不論中國內戰的結果為何，如何探究這個時期杜魯門政府對華政策的制定，以面對風雲莫測的中國政局，就是一項頗具意義的課題。質言之，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存在著外交與軍事上的考量，前者以國務院為主導，後者則以國防部與其所屬的參謀首長聯會議為諮詢對象。

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集中在探究美國軍方，尤其是參謀首長聯會議，無論國府是在中國大陸，或是在台灣，究竟以何種角度協助杜魯門政府制定對華政策。總之，探究軍事單位在美國政府對華政策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傳統上以國務院的角度為切入點，是有所分別的，這也是本文主要的企圖心。



目

次

緒 論	1
第一章 文獻分析	7
第一節 有關參謀首長聯席會議著作的研究分析	10
第二節 中美關係相關著作的分析	14
第二章 戰後美國的全球主義與圍堵政策	31
第一節 肯楠的圍堵理論	35
第二節 杜魯門主義	40
第三節 馬歇爾計劃	43
第四節 國家安全會議第六十八號文件	46
第三章 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	53
第一節 從臨時至正式單位	54
第二節 杜魯門總統的修法	71
第三節 高華德與尼可拉斯法	74
第四節 高華德——尼可拉斯法後的美國軍事發展	80
第四章 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政策計劃處對華主張異同之分析	87
第一節 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過程與特質（1947～1948）	87

第二節 關鍵的 1947 年	93
第三節 沒有中國政策的 1948 年	102
第四節 軍方與文人對華主張的衝突	109
第五章 關鍵時刻的對台主張（1949～1950）	125
第一節 美國對台政策的分期	126
第二節 放棄台灣（1949 年）	129
第三節 中立台灣（1950 年）	150
第六章 參謀首長聯席會議與在華軍事顧問團	165
第一節 美國駐華軍事顧問團之源起及其成立過程	165
第二節 美國在華司令部的撤離	173
第三節 1946～1948 年的美軍顧問團	178
第四節 美國在華聯合軍事顧問團 （Joint U. S.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in China, JUSMAGCHINA）	187
第七章 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李海與布萊德雷 對華主張之分析	195
第一節 李海的對華主張	197
第二節 布萊德雷的對華主張	206
結 論	213
徵引書目	217
附 圖	
圖一：美國國防部的圖解	59
圖二：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64
圖三：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組織表	66
圖四：聯合參謀本部組織	68
圖五：1945～1949 年美國對華決策過程流程圖	89
圖六：美國在華聯合軍事顧問團的組織	190

緒 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文主要在探討美國軍事單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於 1947～1950 年，在對華政策制定上所扮演的角色。為何選擇研究這個軍事單位，動機主要有三：

其一，中美學界在研究 1947～1950 年美國對華政策時，大多著重對國務院的探討，而少有分析軍方之角色與態度。故美國軍方在對華政策所扮演的角色，有進一步研究價值。

其二，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具有外交與軍事的兩重角色。當代知名的政治學者杭亭頓 (Samuel P. Huntington) 曾經歸納杜魯門 (Harry S. Truman) 時代對外關係的四股主要決策者：(一) 杜魯門總統本人；(二) 外交體系中的高層領導階人，如國務卿馬歇爾 (George C. Marshall) 以及艾奇遜 (Dean Acheson) 等人；(三) 國務院中的單位如政策計劃處 (Policy Planning Staff)，與職業外交人員如肯楠 (George F. Kennan) 等；(四) 軍方。^{〔註 1〕} 這四股主力構成杜魯門政府的外交團隊，其成員的專業背景可以區分成軍事與外交層次。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以軍方的身份，卻同時參與美國對外政策的制定，所以此機構的雙重性質，亦頗值得研究。

其三，在對國民政府的態度上，軍方較國務院要來得友善。^{〔註 2〕} 不論是

〔註 1〕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379~382.

〔註 2〕 事實上，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是美國外交的兩大流派，而以後者為主。理想

對國府在大陸時期，或是 1949 年退守台灣之後，國防部長詹森（Louis Johnson）、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前方戰區司令等，都比國務院對國府要來的友好（友善的原因容待後敘）。故軍方對中國與國府的考量，也值得深入探討。

基於上述的三種動機，本文將就 1947～1950 年間，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在美國對華政策上的主張與態度深入分析，並探討其與國務院的互動關係。

二、研究文獻與範疇

本文所採取的文獻資料來源有三：其一是政府出版品、檔案，如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檔案，以及國務院的美國外交文件等。其二是重要當事人如李海將軍（William D. Leahy）、馬歇爾、杜魯門以及艾奇遜等人的個人著作、傳記等。其三是專書與研究成果。

在政府出版品以及檔案方面，最主要的史料有二個，其一是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其中收錄不少有關參謀首長聯席會議與中國的重要文獻。不過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是由國務院所出版，所以收錄文獻的觀點以外交系統為主，軍方的意見則屬次要。其二為 *Record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註 3〕} 此批檔案由 University Publication America, Inc. 以微卷的形式發行。此微卷中的第二部分包括 1946～1953 年的遠東，其中主要為戰後的中國。此微卷主要是根據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檔案，內容除與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重疊部分之外，另有如聯合軍事顧問

主義本來就不是美國外交的主軸，類似賽珍珠（Pearl Buck）對中國所懷有的特殊感情，或者二十世紀初，美國傳教士曾想把中國基督教化的理想主義，在外交政策並不多見。美國的立國者警告，在進行外交政策時，不可以對於特殊的國家進行長期與頑固的敵對態度。同時也不可對其他國家賦予永久的感情，換言之，就是要盡力摒除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曾在著名的告別演說（Farewell Address）中，明白告戒美國民眾：「一國對於他國有熱情的喜愛，也一樣的能產生各種壞處。由於對於所喜愛的國家的同情，遂幻想彼此有共同的利益，實則所謂共同利益僅是想像的，而非真實的，於是把他人的仇恨灌注於自己，結果遇他國與人發生爭執或戰爭時，自己並無充分的理由，而亦陷入其中……我們處理外國事務最重要的原則，就是與他們發展商務關係時，盡量避免與之發生政治關係。」孫同勛譯，《不朽的美國歷史文獻》（台北：新亞出版社，1976 年），頁 48～49。

〔註 3〕 至於國府檔案中有關美國軍事顧問團，可以參考國史館的所藏的《蔣中正總統檔案》，以便和美方資料互證，尤其本文在第陸章的美國軍事顧問團中，會運用《蔣中正總統檔案》作為佐證。

團等史料。

除官方的史料以外，也參考重要人物的著作，除杜魯門總統、馬歇爾將軍、艾奇遜國務卿等人外，此時期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兩位成員也有個人作品。其一是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首位臨時主席李海（William D. Leahy）的 *I Was There*。此書雖然以二戰結束之前為主，不過文中涉及不少作者對中國、蔣介石的意見。其二為布萊德雷（Omar N. Bradley）的 *A General's Life*，布萊德雷是這個單位首任的正式主席，他於 1949 年接替李海成為正式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主席。他在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對華政策，尤其是對台的評估上，扮演著主導的角色。至於專書與研究成果，容後再敘。

由於過去中文學界對於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介紹與討論均很少，故本文對此一機構，也作一概略的探討，以便於呈現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特質。

此外，除了對此機構之發展、組織、職掌加以探討外，本文亦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中之靈魂人物——主席加以分析，因該組織的主席能出席國家安全會議，代表軍方專業立場表示意見，故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之主席的角色特別值得注意，而在此期間的二位主席李海（1942～1949）、布萊德雷（1949～1953），均在對華政策上有特別的立場，故本文除分析該組織的整體對華態度外，亦將另闢專章分析李海與布萊德雷的對華態度與主張。

本文的研究斷限是 1947～1950 年，所以選擇這四年進行研究，原因有二：

（一）1947 年正好是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正式成立，該組織被法律授權可以參贊總統進行外交與軍事的規劃。

（二）1950 年則是韓戰爆發，韓戰可以被視為是美國對華政策的轉捩點。不過本文限斷的前後數年，其他的事件若與本文相關也會加以分析。

三、章節安排

本文除緒論與結論外，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主要是針對文獻與研究成果進行分析探討。由於參謀首長聯席會議是美國政府的一個重要軍事單位，美國學界對此機構的研究頗為豐富，故研究成果分析上，將以美方的著作為主。以時間為經，組織發展為緯，交叉討論以呈現過去學界對此組織之研究。

第二章探討戰後美國的外交策略。將論述美國從戰前的孤立政策到戰後的全球主義，其間的轉變過程是如何考量，同時美國在推展全球主義之際，

如何面對來自以蘇聯爲首的共產集團嚴峻挑戰和重重阻礙。〔註4〕

第三章，則是分析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源起、成立、運作以及改組。

第四章，分析 1947～1948 年，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對華政策。由於參謀首長聯席會議能在杜魯門政府的外交決策過程中表示立場與意見，因此掌握其對中國的看法，有助釐清華府的對華政策。本章將追索「參謀首長聯席會議 1721 系列文件」（JCS-1721）、「國家安全會議第 22、34 號文件」（NSC-22、NSC-34）之擬定與內容，以評估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在美國對華政策之立場與影響。

第五章，分析 1949～1950 年，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對台看法。由於中共從 1948 年底，在大陸取得全面性的勝利，國府於是從 1949 年起，開始退守到台灣。國務院事實上已放棄台灣，有坐待「塵埃落定」之打算，但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卻在此時爲杜魯門政府提出它的對台主張。本章將討論其在美國對台策略上之建議，並就此分析其在美國外交上之影響力。

第六章，論述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如何規劃美國在華軍事顧問團。美國在華軍事顧問團，對於戰後中國軍事的重整與建構，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它除了代表美國願意以軍事方式協助國民政府建立現代化軍隊外，還象徵美方對國民政府的支持。顧問團起源於 1945 年蔣介石主動向華府提出，卻延宕到 1948 年十一月，始在南京正式運作。不過當顧問團甫抵中國，國共內戰已近尾聲，致使顧問團未能發揮功效，並於同年十二月就結束它在華的任務，離開中國。顧問團的規模、性質、任務等，可以說是由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一手策劃的。故藉對此顧問團進的探討，可以進一步探究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對華理念。

第七章，分析首任臨時與正式的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李海和布萊德雷，其對國民政府的看法。根據規定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雖然位高權重，但他卻不能逾越該組織的共同決議，換言之，主席的職權只不過在執行該組

〔註4〕孤立主義一直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的外交的一個重要傳統。就以一次世界大戰直到二次世界大戰前的美國對外政策而論，華府希望透過二個方法維持全球的和平，其一是試圖運用國際間所簽定的條約，例如 1922 年在華盛頓所簽署的四國公約、五國公約以及九國公約。其二則是希望利用各地區的主要強權，如在歐洲借重英國，在東亞則以日本爲主。總之，在孤立主義的指導下，美國寄望運用這兩種方法維繫全球和平，其重要的考慮不外乎是要儘量避免美國捲入國際政治之中，以保持美國孤立的傳統。

織的主張。但不同的主席，基於個人的對華主張，在該組織制定對華政策過程中，肯定會產生影響力。故本章分析李海與布萊德雷兩人的對華主張與態度，可以得出那一位的理念是較有利於國民政府。^{〔註5〕}同時，由分析李海與布萊德雷，更可以顯示此時期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對華態度。

〔註5〕 這二位主席在對華政策上均曾展現個人的主張，前者對國民政府的支持遠大於後者，前者的理想色彩也遠大於後者。其實，歷來不少美國對華政策的主導者在面對中國問題時，也都是在理想與現實主義之間選擇。舉例而言，如同學者柯瑞（Roy W. Curry）在分析威爾遜總統的遠東外交政策時，他指出威爾遜雖帶有宗教理念與改造中國的理想主義色彩，不過究竟威爾遜還是抵不過遠東地區的強權政治，最後是現實戰勝了理想主義。Roy W. Curry, *Woodrow Wilson and Far Eastern Policy, 1913~1921* (New York: Bookman Associates, 1957), pp. 311~322.

第一章 文獻分析

1947~1950 年間，中美關係上產生了許多頗具重要的史事，其中有矛盾、衝突與合作，深深影響日後中美之間的互動。故中外學者曾對於這一時期的研究，積極投注不少的心力，也有相當的研究的成果。例如 Suzanne Pepper, *Civil War in China: The Political Struggle, 1945~194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William W. Stueck, Jr., *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 1947~1950*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1); Steven I. Levine, *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1945~194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June M. Grasso, *Truman's Two-China Policy*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87); David M. Finkelstein, *Washington's Taiwan Dilemma, 1949~1950 -- From Abandonment to Salvation* (Maryland: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Press, 1993)等都是非常傑出的著作。本文在分析 1947~1950 年中美關係的研究成果上，主要採取下列三個方向：

第一是以時間的斷限來取捨。本文在進行成果分析時，選取之對象主要時間斷限集中在 1947~1950 年。不過許多著作都是橫跨在此一時期之上，例如 Lewis M. Purifoy, *Harry Truman's China Policy -- McCarthyism and the Diplomacy of Hysteria* (New York: A Division of Franklin Watts, 1976); 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T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Shu Guang Zhang,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 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s, 1949~1958*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等，亦將一併予以探討。

第二是研究的領域。早期學者的研究根據所能掌握的史料，往往把焦點放在政治、外交方面。例如，學術界曾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把二十世紀初至 1930 年代的中美關係作為研究的對象。^{〔註 1〕}其後，學界又將焦點轉移至戰時的中美關係，因為他們認為戰時的中美關係，關係到美國捲入日後東亞近數十年的外交與軍事糾葛之中。^{〔註 2〕}學者也關心到美國如何把中國帶入國際政治體系之中，羅斯福總統如何提昇中國的國際地位，戰時國際會議與中美外交的關係，以及美國如何援助中國，對抗日本等，^{〔註 3〕}這些都屬於政治、外交的

〔註 1〕關於此時期的主要著作可以參考 A. Whitney Griswold, *The Far East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7); Dorothy Borg,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7); Roy Watson Curry, *Woodrow Wilson and Far Eastern Policy* (New York: Bookman Associates, 1967); Arthur Waldron, *How the Peace Was Lost: The 1935 Memorandum -- Development Affecting American Policy in the Far East*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1992)，尤其是 Arthur Waldron 的著作值得注意，此一著作主要根據曾於 1925～1929 年任職美國駐華公使馬慕瑞 (John Van Antwerp MacMurray)，在 1935 年所寫的一份備忘錄為主，進而分析美國的遠東政策。本書主要分成二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備忘錄的背景介紹；第二部分則是備忘錄的全文。作者指出一個重要的論點，馬慕瑞認為日本並不是如當時美國大部分人所想像的，是導致亞洲大戰的惡棍。日本在 1930 年代的外交政策，並不存在著軍國主義思想，而是一直希望遵守 1922 年的華盛頓條約。而它之所以會對發動 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主要是因為其他國家的行為不斷的破壞華盛頓條約所致。而這些國家則包括中國與美國。Ibid., p. 2. 很明顯的，馬慕瑞認為「九一八事變」，錯不應在日本，而是亞太其他國家違反了國際條約，這些國家也需負起責任。儘管馬慕瑞的備忘錄似乎對中國的外交政策，多所指謫。但如作者所言，備忘錄已成為此時外交事務的經典之作，而柯立芝總統 (Calvin Coolidge) 更盛讚馬慕瑞是「我們的最高中國專家」。Ibid., pp. 8~9. 質言之，此書頗具參考的價值。

〔註 2〕Warren I. Cohen ed., *Pacific Passage -- The Stud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65.

〔註 3〕關於國際會議與中美外交的關係，可以參考，李榮秋，〈珍珠港事變到雅爾達協定期間的美國對華關係〉（台北：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78 年），Richard L. Manser, *Roosevelt and China: From Cairo to Yalta* (Pennsylvania: Temple University, 1987)。有關於美國對華的軍事與經濟援助可參考 Arthur N. Young, *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葉偉濤，〈戰後美國軍經援華之研究（1946～

範疇。故可見許多皆採傳統研究途徑，著重在分析政府間的外交關係。

但 1980 年代以後，學術研究的範疇有擴大之趨勢，除傳統的政治、外交領域以外，學術界把關注擴展到其他橫向面上，例如同時期中美知識份子、新聞界以及教會等在中美關係上所扮演的角色。學術研究的範疇所以會有大幅度的進展，主要受到三項因素所促成：其一是科際整合；〔註 4〕其二是史料開放已朝向自由化；〔註 5〕其三是國際外交的和解。〔註 6〕

1949)》(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美關係研究所碩士論文，1981 年)；李文志，《美援來華(1946~1948)之政治經濟研究——歷史結構的觀點》(台北：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9 年)；文馨瑩，《經濟奇蹟的背後——台灣美援經驗的政經分析(1951~1965)》(台北：自立晚報出版社，1990 年)；陳俊宏，《美國對華經濟援助之研究(1937~1948)》(台中：東海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沈慶林，《中國抗戰時期的國際援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等。值得一提的是沈慶林的著作，此文與其他著作不同處，在於它不但注意到美國對中國的援助，同時也全面的分析各國政府，乃至民間人士的對華援助，這在此研究範疇中是相當罕見而且突出的著作。

〔註 4〕史學界大量運用社會學科的研究方法，例如外交史學者借用威斯康辛學派的理論(Wisconsin School)。Nancy B. Tucker, "Continuing Controversies in the Literature of U. S.-China Relations Since 1945", Warren I. Cohen ed., *Pacific Passage -- The Stud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214。另外也可參考陳寶鈴所著，《美國對華政策之研究(1947~1950)——以紐克特蘭國家利益架構分析》(台北：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 年)，都是借用社會科學的例子。也有學者把觸及面延伸到中國內部如何看待中美關係，關於中國社會如何看待此階段的中美關係，可以參見 Helen Esther Fleischer Anderson, *Through Chinese Eyes: American China Policy, 1945~1947*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80)。有學者則把焦點放在美國國會以及國內政治團體對行政部門的壓力，關於美國國會如何影響行政部門的中國政策，可以參見 James Alan Fetzer, *Congress and China* (Michiga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1969)。同時，學界也越來越重視輿論所發揮的影響力。關於美國輿論界對於華府的中國政策，可以參考，張慶琪，《紐約時報的對華政策(1945~1949)》(台北：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2 年)。質言之，1980 年代以後的研究範疇可謂是包羅萬象。許多新的學科，新的研究方法與理論，被導入歷史領域，以期突破傳統研究的窠臼與限制，進而提出新的觀點與創見。也因為這些科際整合的應用，與大量史料的解禁，使得 1980 年代以後的作品，往往更為成熟。另外一個差異點，就是 1980 年代以來的學者在分析研究時，除了注意重要歷史人物與事件之外，也非常重視政策制定時的文化、經濟、心理與社會等諸多背景。Warren I. Cohen ed., *Pacific Passage -- The Stud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 214。

〔註 5〕無論是美國，大陸與台灣三方面皆有大量新史料的開放。早期由於此段歷史

第三是主要研究者的國籍，這以美國、台灣與大陸三個地區為主。本文在分析時，儘量把這三個地區，同時期，同領域的作品，作比較分析。

第一節 有關參謀首長聯席會議著作的研究分析

本文首先分析最近幾年來學術界中，有關於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論著。

〔註 7〕此方面之研究以美國方面學者為主。若歸納有關撰述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博士論文與專書，可分為二大範疇：（一）著重於分析這個組織如何參與美國全球戰略的規劃，以及區域性戰爭。（二）至於專書部份則集中在論述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的組織結構與制度，他們與上層領導階級的互動，以及這個組織未來的可能發展。

第一個範疇主要以博士論文為主，包括：Lester J. Foltos, *The Bulwark of*

的研究，存在諸多的禁忌，如事涉國家安全與軍事機密，當事人皆還未謝世等因素，因而使得這時期的學術受到局限。雖然八十年代以後的兩岸官方檔案的逐步開放已有一定的成果，台灣方面也有檔案法的制定。不過，就如同有中共學者所直言，現在中美關係史主要還得依靠美國的官方檔案與私人資料。這顯然不是一種正常的現象。所以學者建議，中共相關部門應該有計劃地、分期地、分批地出版一批檔案資料。汪熙、王邦憲著，〈我國三十五來的中美關係史研究〉，收錄於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編，《美國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6年），頁8。總之由於時空的轉移，當此階段的人物逐漸走入歷史，以及意識型態的減輕等，形成有利學術研究的大環境，遂促成諸多的官方檔案史料以及個人資料的問世。許多學者就在這種前所未有的時空環境下，利用眾多的資料，和新的研究方法，撰述出不少與早期截然不同的作品。

〔註 6〕由於國際社會上冷戰的結束，蘇聯與東歐共產主義的解體，全球外交的舒緩，進入後冷戰時代。大陸方面從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藉由新檔案的公布，以及政治環境的放寬，有較週延與深入的學術性著作。汪熙、王邦憲著，〈我國三十五來的中美關係史研究〉，頁3。另外，有關於此時期大陸學界的著作分析，可參考王成勉，《馬歇爾使華調處日誌（1945年11月～1947年1月）》（台北：國史館，1992年），頁10～11。雖然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受到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的衝擊，政治的氣氛又趨緊繃，但還是有幾位年輕、受過良好訓練的學者，從事學術性的研究與著作。Warren I. Cohen ed., *Pacific Passage -- The Stud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 214。至於台灣方面，也受到所謂「第三波民主化」的影響，政治環境的限制不再，學術研究的空間也受到相對保障。加上有不少接受西方學術訓練的學者，投入此一領域中，從而產生不少與往昔不同論點與範疇。

〔註 7〕事實上，除了專著研究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外，還有非常多的單篇文章與評論談及這個單位，但限於能力與時間，所以本文不作介紹。